

中国古代文学： 作家·作品·文学现象

文史哲编辑部 编

文史哲丛刊

 商务印书馆

文史哲丛刊

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现象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史哲编辑部
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文史哲丛刊）

ISBN 978 - 7 - 100 - 07545 - 9

I. ①中… II. ①文…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94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现象

文史哲编辑部 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45 - 9

2012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8

定价：38.00元

出版说明

《文史哲》杂志创办于1951年5月，起初是同人杂志，自办发行，山东大学文史两系的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张维华、黄云眉、郑鹤声、赵俪生等先生构成了最初的编辑班底，1953年成为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之一，迄今已走过六十年的历史行程。

由于一直走专家办刊、学术立刊之路，《文史哲》杂志甫一创刊便名重士林，驰誉中外，在数代读书人心目中享有不可忽略的地位。她所刊布的一篇又一篇集功力与见识于一体的精湛力作，不断推动着当代学术的演化。新中国学术范型的几次更替，文化界若干波澜与事件的发生，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提出与讨论，都与这份杂志密切相关。《文史哲》杂志向有与著名出版机构合作，将文章按专题结集成册的历史与传统：早在1957年，就曾与中华书局合作，以“《文史哲》丛刊”为名，推出过《中国古代哲学论丛》、《汉语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等；后又与齐鲁书社合作，推出过《治学之道》等。今者编辑部再度与商务印书馆携手，推出新一系列的“文史哲丛刊”，所收诸文，多为学术史上不可遗忘之作，望学界垂爱。

文史哲编辑部

商务印书馆

2009年10月

编辑工作委员会

顾 问 孔 繁 刘光裕 丁冠之
韩凌轩 蔡德贵 陈 炎

主 编 王学典

副主编 周广璜 刘京希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大建 王学典 刘 培 刘京希
李 梅 李扬眉 宋全成 陈绍燕
范学辉 周广璜 贺立华 曹 峰

目 录

作家研究

- 关于王维的山水诗 萧涤非 / 3
- 杜甫评论中的几个问题 董治安 / 15
- 关于《李白与杜甫》 萧涤非 / 27
-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
- 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
- 之比较为中心 梁桂芳 / 52
- 柳宗元文学的评价 黄云眉 / 67
- 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日]清水茂著 华山译 / 91
- 论苏轼对宋词的开拓与创新 朱德才 / 117
- 论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 叶嘉莹 / 133
- 曹雪芹世家 杨向奎 / 152
- 蒲松龄对志怪、传奇小说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李茂肃 / 184

作品研究

- 《逸周书》与先秦文学 谭家健 / 201
- 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 姚小鸥 / 216
- 《史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高亨 / 232
- 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 陈直 / 251
- 汉乐府与清商乐 阴法鲁 / 258
- 论汉赋 龚克昌 / 272
- 论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龚克昌 / 298
- 《子虚》《上林》与《七发》的关系 何沛雄 / 316
- 《文赋》的主要贡献何在 牟世金 / 324
- 游仙诗与步虚词 孙昌武 / 341
-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曹道衡 / 359
- 《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 黄公渚 / 374
- 唐代诗画艺术的交融 傅璇琮 陈华昌 / 396
-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朱德才 / 410
- 律赋与八股文 邝健行 / 420

文学现象透视

-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 陆侃如 / 433
- 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 陆侃如 冯沅君 / 441

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	孙元璋 / 457
建安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学的发展	张可礼 / 469
如何理解“建安风骨”	张可礼 / 483
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	殷孟伦 / 495
古典戏剧中浪漫主义初探	冯沅君 / 514
中国小说审美特征的形成与发展	侯民治 / 524
后 记	文史哲编辑部 / 537

作家研究

关于王维的山水诗

萧涤非

“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中的“左相”是王维的弟弟王缙，代宗时的宰相，“右丞”指王维。从当时流传的这两句话来看，王维的诗名确实是很大的，虽然这个“天下”得打上引号。

王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高的诗名，原因虽颇为复杂，比如和王公们交流、善于写应制诗等（王维的应制诗前后期都有），但与他的山水诗取得突出成就有最重要的关系。诗人杜甫在《解闷》诗中，称王维为“高人”：“不见高人王右丞”；称他的诗为“秀句”：“最传秀句寰区满”。所谓“秀句”主要便是指的山水诗。殷璠《何岳英灵集》评王维诗：“在泉为珠，着壁成缙”，也着重在山水诗方面。由此可见，山水景物诗确是王维的拿手好戏，是他的真本领所在。它最能吸引人，但也最易迷惑人。

关于山水诗的讨论已经很有时候了，但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山水诗有没有阶级性，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说：“我们强调山水诗的阶级性，却并不否认有一部分山水诗没有阶级性，只是作为单纯表现自然景色，或是只表现作者对自然景物生理上的感觉（听觉、视觉等）。”^①而他所举的例证，却正是王维的《鸟鸣涧》等山

^① 叶秀山：《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水诗。

难道王维的山水诗或者说他的某些山水诗真的没有阶级性吗？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任何人的任何山水诗都有阶级性，王维的山水诗，不但不是例外，而且它的阶级的烙印特别深刻，特别鲜明。从这些作品所独有的艺术境界、艺术风格来看，我们还不妨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因为都打上了“王记”的戳子。

我始终觉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有毒素的，似一粒裹着糖衣的毒丸。因为在那幽美的自然景物的背后，在那些明月清风、青山白云的外衣下，潜藏着、掩盖着一个丑恶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渗透着一种没落的僧侣式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悠闲、冷寂、孤独的情调。它给予人们的感受，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向上，而是没落；不是斗争，而是妥协；不是乐观积极，而是死寂消沉。附带声明一下，这里所谈的主要是王维后期所写的山水诗，在他前期作品中虽也有一些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但只是偶尔涉及，严格地说，并不是什么山水诗。盛唐以后，律诗渐发达，律诗中二联要对，一联写景，一联言情，差不多成了唐人的一套公式，而写景的那一联，通常离不了山水，如果把这些只是附带或偶尔涉及山水描写的诗都算作山水诗，那山水诗和山水诗人就未免太多太滥了。

我对王维的山水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感觉，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分析：

首先，从他从事写作这些山水诗的时代来看，作为一种创作道路、创作方向，这些诗就应该受到彻底的批判。即使这些诗写得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得加以批判。大家知道，王维的山水诗差不多都是在开元末年到安史之乱前后的二十年间写的，而这二十年间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用杜甫的话来说，这就是“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时代，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就

是“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许多诗人的态度都变得严肃了，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正视现实，深入现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这时就写了不少现实主义的诗。他本是“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当听到安禄山作乱时，他从庐山上跑下来，山也不游了。

然而，诗人王维却和时代背道而驰。他一心一意在经营他自己的世外桃源，最初是“终南别业”，后来是“辋川别业”，俨然成了一个庄园大地主，过着“云霞成伴侣，虚白待衣巾”的亦官亦隐的生活。前期的一点雄心壮志，这时反而消失净尽。他自家逃避现实，大写其山水诗不去说，还要扩大他的消极影响：“时吟招隐诗，或制闲居赋”（《丁寓田家有赠》），勾引裴迪、储光羲、祖咏、丘为、张諲、綦母潜等为同调，在当时诗坛上俨然形成了一个山水田园诗的流派。他经常利用自然景物引导人们逃避现实，如云“但去莫复间，白云无尽时！”（《送别》）“山中有桂花，莫待花如霰！”（《崔九弟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春草也罢，桂花也罢，白云也罢，都成了他招隐的工具。

山水田园诗的出现，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福音”。这类诗的抬头，更不是什么好事。它在文学史上往往起着一种消极的促退作用。我们知道，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导者，可是他在《与元九书》中是曾经对山水田园诗进行了攻击的，他说：“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可见这种诗和现实主义的新乐府是对立的。如果不批判，不打倒，大家都陶醉在山水田园之间，那么新乐府运动便难以发动和开展。像王维这样，在国家危机四伏、人民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反而大作其山水诗，其危害自然更大，这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山水诗和时代环境、时代要求实在太不相称了，应该说，只有毫无心肝的有闲阶级的人才能

安下心来写作这类诗。

所以，从写作的时代来看，王维山水诗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不是一句两句，一篇两篇，而是全部。

其次，从王维山水诗本身所表现或流露出来的世界观、思想感情来看，我认为也是不健康的，有毒的。

在宇宙观上，王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有神论者。他笃信佛教，相信生死轮回，说他自己“前身应画师”；并相信因果报应，供菩萨可以得福，所以他要“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与胡居士皆病》）。他还相信佛法无边，所以上表请求施庄为寺，说什么“惟佛力之可凭，施寺之心转切”。他竟然荒谬到把“年谷颇登，逆贼皆灭”这样的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血汗才换来的胜利果实，归结为皇帝的“施粥”，说成是“报施之应，福佑昭然”（《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

在人生观上，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一则说：“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饭复釜山僧》）再则说：“俯仰天地间，能为几时客？”（《叹白发》）从而对人生他采取了庸俗的颓废享乐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这就是：“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酌酒与裴迪》）

王维早期虽也曾说过“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一类的话，但实际上他很少考虑到“济人”的问题。因为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被服圣人教，一生自穷苦！”而他是不愿意吃苦的。他在创作上走上山水田园的道路，也正是为个人打算。《愚公谷》诗说：“行处曾无险，看时岂有深？”在那个时代，不去触动权贵们的一根毫毛，只写些流连光景模山范水的东西，不用说，是最“无险”的了。顾亭林在他的《日知录》中曾这样指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①这确是值得注意的。所以对于王维早期诗中某些近

^① 《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

于自我表彰的词句不能过于相信，如“偶耕”、“安贫”、“为农”等，都有很大的虚伪性。

上面说过，王维是佞佛的，这就使得他的个人主义有些与众不同，从而使得他的山水田园诗也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意境。表面上他好像很“慈悲”，不饮酒，不食肉，连鱼也不钓，其实很残忍。因为在个人修养方面，他采取了佛教克制感情所谓斩断尘根的办法来麻醉自己。他认为“爱”是病根：“因爱果生病”，所以要破除“爱染”：“爱染日愈薄，禅寂日愈固。”（《偶然作》）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视弟妹如路人：“性空无所亲”（《山中示弟》），才能消除一切烦恼和伤心：“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消？”他并公开宣扬他是“日与人群疏”的，是“万事不关心”的。当然，实际上并不如此。他说：“好读高僧传”，“遥爱林木秀”，又说：“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可是他关心的事并不少，也自有他的一群人，不过不是人民之事，不是人民群众罢了。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王维的山水诗中缺乏应有的热情和同情，比如在陶潜诗中我们还可以读到“田家岂不苦？不获辞此艰”，在柳宗元诗中也可以读到“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这类同情农民痛苦的诗句，在韦应物诗中还可以读到“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类觉得愧对劳动人民的诗句，而在王维诗中却读不到。这是无足怪的，“万事不关心”，哪里来的热情和同情？

由于信佛，在生活方式上的特点，便是出奇的“好闲”和“好静”。如《渭川田家》：“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又《戏赠张五弟諲》：“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又《饭复釜山僧》：“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又《春日上方即事》：“北窗桃李下，闲坐但焚香。”这类诗句是很多的，所以在他的山水诗中我们所经常看到的诗

人的形象，是“闲居”、“闲坐”、“独坐”、“端坐”、“夜坐”、“高卧”、“坐看”、“卧视”、“倚杖”、“倚树”、“弹琴”、“安禅”等等。裴迪的和诗自言“好闲早成性”，其实王维更是这样一个好闲成性的诗人。不用说，这是那有闲阶级的阶级性。而他的山水诗便是好闲成性的产物。《辋川集》序说他“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这倒是实话。

有闲的生活，好闲的习性，形成了他那独特的闲情逸致。在他的心目中，一切景物都蒙上了一层闲悠的色调。水是闲的：“寂寥天地暮，心与广川闲。”（《登河北城楼》）“秋色有佳兴，况君池上闲。”（《崔濮阳兄季重前山兴》）郊原也是闲的：“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登裴迪小台》）月亮也是闲的：“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汛前陂》）鸟叫也是闲的：“窗外鸟声闲。”甚至在劳动人民身上他也能发现闲情味而不胜羡慕：“田父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暇，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由于亦官亦隐的优裕的生活条件，使王维有可能把谢灵运的游山玩水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结合在一起，但他这种好闲劲，又使他既不同于谢灵运，也不同于陶渊明。在陶诗中，有诗人自己的劳动生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谢诗中也能看到诗人的紧张活动：“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而这些，在王维诗中却没有或很少见。

由于信佛，在处世态度上，他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滑头主义。在《与魏居士书》中，他嘲笑了那个“洗耳”的许由，嘲笑了那不肯“俯受维繫”的嵇康和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以至后来弄到“乞食”的陶潜，并责问陶潜：“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最后，他借用了（同时也歪曲了）孔子的话：“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① 在《与

^① 《论语·微子》。

胡居士皆病》诗中也说：“无烦君喻马，任以我为牛。”这后一句是用的《庄子》语：“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意思就是说你叫我什么都行。同样是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滑头主义的表现。这就难怪他一方面对提拔他作左拾遗的张九龄表示同进退：“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而另一方面，没隔几个月，却又对张的政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大颂其功德（《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当他被迫做安禄山的官时，一面“服药取瘡”表示一点抵抗，并私下对裴迪口吟了那首《凝碧池》的诗，对唐王朝表示一点依恋。

诗，是人作的，总是受作者的世界观的制约和支配的。因此，王维的“无可无不可”主义，在他的一些山水诗里，在他对待山水景物的态度上也同样有所表现。例如《终南别业》：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这是历来传诵的名句。表面看来，好像很达观，此路不通，咱便坐下，不能观水，咱就抬头看看云，又有何不可，反正是消遣，但实质上是滑头、屈服、妥协。我们只要拿李白的“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的诗句作一对比，就更容易看透它的软弱无力。阮籍毕竟还有热情，有点火气，有点反抗性，他碰到“途穷”，还会“恸哭”，而王维则是无所谓。此外，如曾为蒋孔阳引用时删去的那《山居秋暝》的末两句：“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也一样是貌为达观。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的春天也好，百花衰谢的秋天也好，都可随它去，我（王孙）自可受用我的。朱子评王维诗“萎弱少气骨”，是有见地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这些思想感情能说是没有毒的吗？它是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还不明显吗？

再次，从王维对自然景物的选择与评价所透露的审美观点来看，他的山水诗也是无甚可取的。